

作为传统信仰文化载体的祇园祭

——日本京都祇园祭考察札记

叶 涛

摘 要:京都祇园祭是日本最著名的节祭活动。以2018年对祇园祭的实地考察为基础,有助于探讨作为日本传统信仰文化载体的祇园祭,在历史起源、山鉾巡游和仪式变迁等方面的诸多问题,进而可以发现信仰文化是祇园祭得以传承千年的基础。

关键词:祇园祭;八坂神社;山鉾巡游;节日;祭典仪式;非物质文化遗产

DOI:10.13370/j.cnki.fs.2018.06.017

每年的7月,持续时间长达一个月的京都“祇园祭”,是日本最著名的节祭活动,它与东京的“神田祭”、大阪的“天神祭”合称“日本三大祭”,与同在京都举行的5月的“葵祭”、10月的“时代祭”合称“京都三大祭”。

京都祇园祭中的29座山鉾^①本体及其重要悬挂品于1962年被指定为国家重要有形民俗文化财^②，“祇园祭山鉾行事”于1979年被登录为国家重要无形民俗文化财,祇园祭成为日本屈指可数的双遗产保护项目。2009年,由日本政府申报的“京都祇园祭山鉾巡行(花车巡游)”入选该年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③

2018年夏,笔者在位于京都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访学,得以对2018年度的祇园祭进行较为全面的观察。同时,参考相关研究资料,对祇园祭的起源传说、仪式变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进行了初步梳理。在此,本文仅从日本传统信仰文化传承的角度,就祇园祭中的相关问题略述己见。

一、祇园社、八坂神社与京都祇园祭的起源

在京都最繁华的四条大道的东首,赫然伫立着八坂神社十分醒目的朱红色大门,是为京都最具标志性的建筑形象。今天的八坂神社,在明治维新之前,称作“祇园社”。“祇园”一词,来自于早期佛教的“祇园精舍”。祇园精舍位于中印度,是佛陀说法遗迹中最著名的处所。祇园社供奉的主神“牛头天王”,也是“祇园精舍”的守护神。由此可见,“祇园社”原本是具有浓重佛教气息的寺院。

祇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七世纪中叶,“渡来人”(来自大陆或朝鲜半岛的移民)在山城国(今京都)建立的一座佛教寺院,后被命名为“祇园感神院”。其后一千余年,祇园是以佛教信仰为

作者简介:叶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732)。

① 鉾,古同“矛”。鉾车,在祇园祭中特指于车部顶端树立长矛的台车。

② 1962年被指定为“重要有形民俗资料”;1975年,随着保护制度的修订,改称为“重要有形民俗文化财”。

③ 该项目名录后由日本政府撤回,一并纳入日本政府另行申报的“Yama, Hoko, Yatai花车巡游”组合项目中,该组合项目已于2016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该项目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登录情况及其变化,特别感谢巴莫曲布嫫研究员提供的上述信息。另,该项目的申遗情况还可参考林承纬:《无形文化遗产京都祇园祭山鉾巡行的申遗历程与文资保护:兼论台湾王爷信仰习俗申遗的可能》,(台北)《文化资产保存学刊》第38期,2016年。

主、本土神道融合其中的信仰场所。明治元年(1868年),日本政府颁布“神佛分离令”,“祇园社”改名为“八坂神社”,成为一座纯粹的神道之社,供奉其中的佛像也被移到了其他寺院。但是,神社所举办的最重要的节祭活动依然称作“祇园祭”,由神社氏子组成的传统居住社区依旧称作“祇园”。

祇园祭,又称“祇园御灵会”,是八坂神社及其所辖地区的例行祭祀与节庆活动。在日本人的观念中,“所谓御灵泛指蒙冤离开人世的灵魂、即冤魂,人们将突如其来的天灾、瘟疫,特别是瘟疫看作是这些冤魂在作祟,因此,怀着畏惧和敬畏的心情称他们为御灵,尽自己所能安抚他们,祈祷他们不要加害活着的人”^①。“御灵祭”的称谓恰恰道出了祇园祭起源的本意:祭祀冤魂亡灵,祛除瘟疫灾害。^②

关于京都祇园祭的起源,学术界的观点并不一致,比较流行的说法是:日本平安时代贞观年间(859—877年)^③,全国流行瘟疫,人们认为这是御灵(冤魂)作祟的原因(一说是牛头天王作怪),为了安抚冤魂、驱除病魔、祈求健康,皇室命令制作了象征六十六个地方(方国)、长约两丈的六十六根长矛(即“铎”),将它们送往神泉苑供奉,用以安抚御灵(祭祀牛头天王)。此外,还有诵经活动,并举行歌舞和音乐演奏等用以娱神。虽然这些活动的目的是为了镇魂驱魔,但其娱乐热闹的程度并不亚于过节。

虽然后世祇园祭的山铎巡行(花车巡游)成为祭典中最引人瞩目的内容,但其祈求健康平安、驱除瘟疫灾祸的核心内涵始终一脉相承、千年延续,在今天祇园祭的各项活动中,在信仰空间(主要是八坂神社本殿)里面举行的一系列祭典仪式,依旧因其神圣性而不向普通市民和游客开放。

二、京都祇园祭的“山”与“铎”

“山铎巡行”(也称“花车巡游”)是京都祇园祭最重要的仪式性活动,那么,什么是“山”?什么是“铎”?

“山”与“铎”都是车的形状。祇园祭的活动以“山车”为主,所谓“山车”,指日本民间传统祭典活动时出现的台车,其上或有屋顶或有各式装饰,每个山车还会有不同的名称。京都祇园祭的山车,既是节庆期间神灵所依附的处所,同时本身就是神灵的象征。已有学者详细考证过日本祭典中这种山车(花车)巡游的形式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此不赘述。^④

祇园祭的山车型制分为“山”与“铎”两大类,又习惯统称为“山铎”。

“山”的形制相对较小,多为单层,无顶,车上大多装饰有松树,并安置有表现一定故事情节的木质偶像。山车从地面至树顶一般有五六米高,重量也相对较轻(约1.2—1.6吨),过去是由许多人肩扛着巡游,但是现在已经全部安装上了车轮。

“铎”的形制则要高大的多,从地面至顶端往往高达二三十米,重量多达十几吨,必须依靠大家齐心协力才能够拉动。“铎”都是两层,上层空间较大,安装有屋檐,像一座装饰华美的小亭台,亭子顶端会树立一根长达十余米的“铎杆”,例如每年巡游队伍打头开路的“长刀铎”,其树立在车项的“长刀”便成为祇园祭的标志性景观。铎车上亭子内的空间,可以坐得下由二三十人组成的演奏“囃子”^⑤的乐队。除乐队外,亭子面向头部的前面还会装饰有象征神灵的木偶小儿(稚儿)。过去各个山铎町都是选择本社区的儿童扮饰稚儿,如今只有长刀铎尚为真人,其余的均改为木偶了。

① 蔡敦达:《京都祇园祭及其中国元素》,刘晓芳主编:《日语教育与日本学研究——第五届大学日语教育研究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0年。

② 参见姚琼:《日本瘟神祭祀历史变迁考》,《世界宗教文化》2015年第5期。

③ 也有学者将祇园祭的起源时间精确到贞观十一年(869年)。

④ 黄宇雁:《祇园祭与其中国文化渊源》,《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

⑤ 囃子,日本祭典音乐的总称,一般是由太鼓、笛子和钲三种乐器演奏。京都祇园祭中的囃子表演,由各山铎保存会负责组织,演奏人员均为所在社区的市民,各个乐队表演的曲目各不相同。

“山”“銚”的组装(“山建”“銚建”)全部由各个社区民众负责,组装时采用传统工艺,不使用一个铁钉,全部使用草绳和麻绳捆绑扎制,数吨重的车体被组装得十分结实。尤其是动辄十几吨的銚车,上面还会乘坐二三十人的乐队,在行进中会被拽拉直行、拐弯侧行,对车体的捆绑扎制技术要求极高。

尽管机械动力已经发展到能够登天入地的水平,但是,在祇园祭中,无论是“山车”还是“銚车”,其行进的动力完全依靠人力推拉,始终保持着最原始的动力形态。这种以人力作为动力的传统,导致参与大的“銚车”巡游的壮劳力人员一般需要七八十至上百人,小的“山车”巡游也需要四五十人,因此,社区民众的积极参与是保证祇园祭山銚巡游千年存续的基本前提。

如今,每一个“山”“銚”都有一个属于“公益财团法人”性质的保存会,并且在各个山銚町内都有一个专门保存“山”“銚”文物资料的会所,前祭和后祭之前的“宵山”展示、展演活动主要都是在会所内举行。

2018年度的祇园祭,山车和銚车共有33组,其中前祭23组、后祭10组。前祭23组包括:长刀銚、函谷銚、鸡銚、菊水銚、月銚、放下銚、船銚、岩户山、宝昌山、孟宗山、占出山、山伏山、霰天神山、郭巨山、伯牙山、芦刈山、油天神山、木贼山、太子山、白乐天山、绫伞銚、螳螂山、四条伞銚。后祭10组包括:北观音山、南观音山、桥弁庆山、鲤鱼山、净妙山、黑主山、役行者山、铃鹿山、八幡山、大船銚。^①从这些山銚的名称中,我们可以发现,这里面既有日本历史文化事件与地域特色,也明显地受到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如函谷銚、郭巨山、伯牙山、孟宗山、白乐天山、鲤鱼山等。对于祇园祭山銚所包含的中国文化元素,已有专文予以论述。^②

以山车巡游(或称“花车巡游”)形式为主的各类祭典在日本各地非常普遍。当然,这些祭典都以各地的民众聚居地为活动空间,并且融入了各地的历史文化和风土民情,具有了各自的地域特色。京都祇园祭被认为是日本各地这类山车巡游祭典的源头。

三、京都祇园祭的仪式及其变迁

祇园祭的仪式包括两大部分,其一是在八坂神社内举行的各类祭典,特别是在神社本殿内的仪式,这部分内容神道教色彩浓重,一般不对普通市民和游客开放;其二是在各个町街山銚驻扎地举行的仪式性活动,以及宵山、前祭、后祭等最终以山銚巡游为高潮的娱乐狂欢性活动,这些活动市民和游客都可以参与。

虽然祇园祭中被关注度最高的是以山銚为主的巡游活动,但是,祇园祭除去山銚巡游,还有非常重要的以八坂神社三乘神轿为主的神輿出行(神幸祭)仪式,这是八坂神社所奉祀的主神离开本宫而巡行所辖社区,为辖区民众祛除瘟疫灾祸、保佑健康平安的十分重要的仪式性活动,这部分内容因其宗教色彩浓重,往往被人们所忽视。

据史料记载,早在12世纪中叶,描绘京都社会生活的《年中行事绘卷》第九卷中,便描绘有神轿返回祇园本社时行进在三条大道上的情景。神轿巡游的队伍,包括打头阵的四马四骑手、紧接其后的两把大伞、骑在身上的两个巫女、王舞、狮子舞和四把长矛,最后是五位骑着马的祭主。从平安后期(898—1184年)到镰仓时期(1185—1332年),祇园祭的主要活动就是以三顶神轿为主的巡游队伍和在驻蹕的御旅所举行的祭祀神灵的各类乐舞活动。

以山銚为主的彩车巡游的出现要比神轿巡游晚了很多年,大约在14世纪中叶的南北朝时期,当时的贵族日记等资料中才出现彩车的踪影。但是彩车数量发展的速度非常快,在应仁之乱

① 京都祇园、八坂神社编印:《平成三十年度 祇园祭》(内部资料),2018年。

② 蔡敦达:《京都祇园祭及其中国元素》,刘晓芳主编:《日语教育与日本学研究——第五届大学日语教育研究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0年;[日]原田三寿:《祇园祭山形彩车伴奏之起源探索》,朱晓兰译,《文化艺术研究》2009年第5期。

(1467—1477年)之前,参加祇园祭前后两祭的彩车数量达到了空间的58辆,其规模及其影响可与今天的祇园祭相媲美。对京都发展和日本历史影响极大的长达十年的应仁之乱,祇园祭被迫中断,直到明应九年(1500年)才得以恢复,恢复当年参加巡游的彩车数量为36辆,规模远不如从前。^①进入江户时代(1615—1865年),祇园祭的宗教性祭典和山鉾巡游(彩车巡游)基本上被固定下来,大多延续至今。

历史发展到明治初年(1868年为明治元年),日本社会处于历史大变革时代,加之迁都东京,祇园祭被迫停办,直至明治五年才恢复活动。这期间,对祇园祭影响最大的因素有二:其一,明治政府的《神佛分离令》,使祇园祭的宗教仪式完全成为纯粹的神道教仪式,佛教元素退居次位(只在部分山鉾会所和悬挂物中得以呈现)。其二,明治政府采用太阳历,祇园祭的活动日期也相应做了调整。按照旧历,前祭时间为六月七日,后祭日期为同月的十四日,改历后,经过数次调整,直到明治十年,才确定前祭和后祭的日期分别为新历的7月17日和24日。此后,带有鲜明的“明治色彩”的祇园祭的主要仪式一直延续至今。

笔者于2018年7月在京都实地考察了祇园祭仪式活动,虽然勤于奔波,但只身孤影,分身乏术,对于仪式的观察首尾难以兼顾,而祇园祭的仪式繁杂,各类活动贯穿7月整整一个月,考察中常常情不自禁发出赞赏而又无奈的长叹。

2018年度祇园祭的各类活动,以八坂神社印行的《平成三十年度 祇园祭》手册最为详细,也最为权威,现择其要抄录如下:

1日至5日:各山鉾町举行“吉符入”仪式。

1日上午10时:长刀鉾町参与祇园祭活动的人员、特别是甄选出的稚儿参拜八坂神社。

2日上午10时:在市役所,由京都市长主持“阄取式”,即决定7月17日前祭和24日后祭山鉾巡游顺序的抓阄仪式。

2日上午11时30分:山鉾联合会成员参拜八坂神社。

7日下午2时30分:绫伞鉾稚儿及其参与人员参拜八坂神社。

10日至13日:鉾建(前祭)。

10日上午10时:神用水清祓式。

10日下午4时半至9时:祇园万灯会“迎提灯”。

10日下午8时:神輿洗式。

12日至13日:鉾曳初(前祭)。

12日至14日:山建(前祭)。

13日至15日:舁初(前祭)。

13日上午11时:长刀鉾稚儿参拜八坂神社。

13日下午2时:久世稚儿参拜八坂神社。

15日上午4时30分:斋竹建。

15日上午10时:生间流式庖丁。

15日下午3时:传统艺能奉纳。

15日下午8时:宵宫祭

16日上午9时:献茶祭(表千家元奉仕)。

16日上午9时:丰园泉正寺櫛建。

16日下午6时30分:石见神乐。

^① 蔡敦达:《京都祇园祭及其中国元素》,刘晓芳主编:《日语教育与日本学研究——第五届大学日语教育研究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0年。

- 14日至16日晚间:宵山(前祭)。
 16日晚间:宵宫神賑奉纳行事。
 16日下午11时:日和神乐。
 17日上午9时:山鉾巡行(前祭)。闾改。
 17日下午4时:神幸祭。
 17日下午6时:神輿渡御出发式。
 17日至21日:山·鉾建(后祭)。
 20日至21日:鉾曳初、山舁初(后祭)。
 20日下午3时:宣状式。
 23日上午9时:煎茶献茶祭。
 23日下午2时:清祓式
 23日下午1时:琵琶奉纳。
 21日至23日晚间:宵山(后祭)。
 23日下午10时:日和神乐。
 24日上午9时30分:山鉾巡行(后祭)。闾改。
 24日上午10时:花伞巡行。
 24日下午11时:还幸祭。
 25日上午11时:狂言奉纳。
 28日上午10时:神用水清祓式。
 28日下午8时:神輿洗式。
 29日下午4时:神事济奉告祭。
 31日上午10时:疫神社夏越祭。^①

在2018年祇园祭的考察中,笔者大约只看到了三分之一的仪式活动,上述拟定的仪式里面还有两项仪式出现变动:其一,24日上午10时的花伞巡行,是祇园地区的艺伎们身着盛装、手擎花伞的巡行活动,是近五六十年以来祇园祭中的一道靓丽景致,但因当日气温酷热而被取消;其二,28日的神用水清祓式,因气象预报台风将至,仪式简化。

四、京都祇园祭的信仰空间与娱乐空间

祇园祭的活动,在时间上贯穿整个7月,在活动空间上则遍布京都传统祇园社区的各个山鉾町,主要集中在河原町通以西、松原通以北、堀川通以东、御池通以南的传统商业市区内,主要是属于京都商业社会市民阶层的信仰与娱乐活动。

祇园祭中的信仰活动,集中在八坂神社、御旅所和各山鉾的会所中,这些空间自然就成为祇园祭的神圣空间。

八坂神社的历史在前文中已经提到,它是祇园社区民众的传统信仰场所。祇园祭既是八坂神社的例行祭祀仪式,也是祇园社区民众参与其中的集体娱乐活动。在祇园祭的仪式中,诸多参拜仪式都是在八坂神社的本殿中举行,仪式由神社的神职人员主持,不对普通市民和游客开放。

7月17日至24日,神轿驻跸四条御旅所期间,御旅所就是神社神灵的神圣殿堂,每天傍晚都会有山鉾保存会的囃子乐队前来演奏娱神,同时也让路过御旅所的市民和游客得到欣赏囃子乐曲的机会。

^① 京都祇园、八坂神社编印:《平成三十年度 祇园祭》(内部资料),2018年。

在前祭和后祭的宵山期间(14日至16日、21日至23日),各山鉾会所也会布置本山鉾奉祀的神灵(大多就是各自山鉾车上的人物形象),供市民和游客参拜,同时各会所都会售卖祇园祭特有的、写有汉字“苏民将来之子孙也”的辟邪物——“粽”。宵山期间,还会允许市民和游客登上鉾车参观。由于鉾车上层的空间被认为是神灵依附之所,过去是不允许妇女登车参观的。如今,除了长刀鉾和放下鉾依旧不允许女性登车参观外,其余的山鉾会所及其鉾车二层都已经对妇女开放。

祇园祭期间,各个山车、鉾车搭建而成后所处的位置,就是市民日常生活的街巷,有的甚至就直接矗立在繁华的四条大道上(如长刀鉾、四条伞鉾等)。在祇园祭长达一个月的时间里,这些日常生活的世俗空间,既成为山车、鉾车神灵依附其上的神圣信仰空间,也是展示各个山鉾历史文物、演奏囃子乐曲、售卖辟邪物品和文化创意产品的综合性娱乐空间。

每年7月17日前祭和24日后祭的山鉾巡游是祇园祭最主要的活动,山鉾巡游的线路是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而形成的,其巡游所经过的街巷应该就是祇园祭奉祀神灵庇佑的区域,因此巡游线路本身也具有了一定的信仰的意义。1943年至1946年,二战后期及日本投降后的头两年,京都祇园祭的山鉾巡游停止举行,直至1947年才得以恢复。20世纪50年代之后,京都观光业急剧发展,来京都的游客数量急速增加,有些游客甚至就是冲着祇园祭而来。在1955年,有人曾提出为了促进旅游、服务游客而改变山鉾巡游路线的建议,但遭到了以重视祭祀仪式传统的神社等方面的坚决反对,由此而引发了祇园祭到底“是出于信仰还是为了旅游”的大讨论。这场讨论对于祇园祭的发展非常重要,此后,学术界对于祇园祭的关注也有增无减。可以说,在顺应民意、尊重历史、保护传统的前提下,政府、神社、民众等都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对祇园祭的良性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综上所述,作为日本传统信仰文化载体的祇园祭,信仰的内核是其得以传承千年的基础。当然,京都祇园祭可以探讨的方面还有很多,例如,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祇园祭,在日本文化财保护法的范围内,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框架下,所保护的祇园祭的内容有哪些差别?在社会近代化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城市化的变化过程中,祇园祭的传承与保护有哪些经验值得认真总结?祇园祭的历史与传承对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传统文化的保护有哪些借鉴意义?等等,这些都还有待于今后做更加深入的调查与研究。^①

[责任编辑 王加华]

^① 2018年7月16日,正在京都进行移地教学的台湾逢甲大学王嵩山教授,邀请京都产业大学村上忠喜教授在龙谷大学为台湾师生做演讲——《京都祇园祭的历史与民俗》,其中关于祇园祭的信仰内涵、传承与保护等方面的内容,本人听讲后受益良多,特此致谢。

salaries for one year after serving their apprenticeships. They are also oriented on performances and learn from them. The overall method of inheritance and corporal punishment are prevalent in Coban. These points are all related to the profit-making management of Coban. Coban's achievements and deficiencies in cultivating talents are mainly due to the rules of the economy which acts with/against the laws of drama education. They are products in certain historical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Key words: Coban; profit-making; Chinese Opera; inheritance

Worship of Industry Gods in China: Folk Belief, Industry Organization and Regional Society

DENG Qingping, WANG Chongrui

It is a common phenomeno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that people of all walks of life worship their ancestral gods or protective gods. As a unique folk belief, the worship of industry gods is the spiritual symbol of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based on industry relations. Through the common ancestral god belief and sacrificial ceremony, the integr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industry organizations can be realized. The study of the industry god worship can not only help understand the belief culture and mentality of the practitioners from different industries in Chinese history, but also apprehend the specific region's industrial structure,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and grassroots social order. By reviewing of and reflecting on the previous research on this issue, we can find a new starting point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industry god belief from both the method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Key words: industry god; folk belief; sacrificial organization; industry organization; regional society

***Shigandang* Culture in Ryukyu Islands in the Perspective of East Asia**

LIU Xiaofeng

This paper takes the materials collected from field research in Ryukyu Islands as its basis, surveys the sources relevant to *Shigandang* culture in the greater East Asian region, and performs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the cultural position of *Shigandang* culture in Ryukyu Islands. The author indicates that historically there has been a long-established influx of Chinese culture to Ryukyu Islands, which sedimented into both material and immaterial local cultural elements. *Shigandang* culture's current form of existence in the Ryukyu Islands vividly reflects the process of how Ryukyu Islands developed its own culture under the influence from multiple sources, including China, Japan, the Korean Peninsula, and Southeast Asia, while continuously internalizing the greater East Asian culture into its own. This paper also notes the latest derivatives of *Shigandang* culture in Ryukyu Islands' contemporary society and considers them as a part of continuous local internalization of *Shigandang* culture.

Key words: *Shigandang*, Ryukyu, cultural interaction, Mount Tai, East Asia

Gion Festival as a Carrier of Traditional Belief Culture: Notes on the Research of

Kyoto Gion Festival in Japan

YE Tao

Kyoto Gion Festival is the most famous festival worship activity in Japan. Based on the fieldwork of Gion Festival in 2018, this paper explores many issues of Gion Festival as a carrier of traditional belief culture such as historical origin, Yamahoko-junko and ritual changes, and further points out that belief culture is the basis on which Gion Festival is passed down for millennium.

Key words: Gion Festival; Yasaka shrine; Yamahoko-junko; festival; worship ritual; intangible culture heritage